

## 评点测议

张 小钢

评点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批评形式，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关于评点的研究却并不多见。在此，笔者想对评点的起源、形成、发展和衰亡的过程作一个基本考察，以达到抛砖引玉之目的。

### 一 有关评点起源的诸说

评点起源于何时，历来诸说不一。清人章学诚认为，评点起源于南北朝。他在《校讎通义·宗刘》中写道：“评点之书其源亦始钟氏《诗品》、刘氏《文心》。然彼则有评无点，且自出心裁，发挥道妙，又且离诗与文而别自为书信哉。其能成一家之言矣。”（卷一）然而，章学诚把评与点分开考虑，他承认《诗品》《文心雕龙》都是“有评无点”，所以他讲的评点当是“批评”之意。

清人曾国藩对这一点说得更清楚：“刘勰钟嵘之徒，品藻诗文，褒贬前哲。其后或以丹黄识别高下，于是有评点之学。”（《经史百家简编·序》）所谓“丹黄”，即丹铅、雌黄等用于点书之颜料。评与点二者合一，始为评点之学。故评点的形成当于南北朝稍后时期。

然而，钟、刘二书皆系文学批评之巨著，非就某书逐段逐句之批点，可视为评点之批评思想之源流。评点之批评，特指附于某书之评语。评为宾，书为主也。因此，清人刘声木指出书有评语应始于唐代。他在《苕楚斋续笔》〈撰述体例所始〉条里写道：“选本诗之有评语，实自唐殷编《河岳英灵集》始。点定他人之诗，实自唐元结编《篋中集》始。”（卷五）刘声木顺便说明此皆从《四部提要》中来。可见清人一般认为评点之评的形式上的源流应始于唐代。

那么，评点究竟始于何时？刘声木认为应始于宋代。他在《苕楚斋随笔》“评点书目”条里写道：“评点始于南宋诸儒，当时选本，若宋楼昉编《崇古文诀》三十五卷，宋谢枋得《文章轨范》七卷，卷中始有评点勾抹，后世皆称善本，即《四库提要》亦称其善。后来明人踵行其法，变本加厉，几无于一书不评点，无一人不评点。”（卷五）评与点合二为一，当形成于宋代。然究其起源，尚无定论。<sup>5</sup>然如前所引，就评而言，始于南北朝，就点而言，则当更早。故评点之起源尚有待商榷。

### 二 所谓评点的“点”

如前所述，评点包含评与点两方面的要素。就点而言，其发生的历史远比评要早得多。

《礼记·学记篇》里，有“一年，视离经辨志。”<sup>6</sup>的内容。对于“离经”的解释，汉代的郑

玄解释为：“离经，断句绝也。”即断句之意。清人黄以周则认为郑玄所言“断句绝也”有“句断”与“句绝”两层意思。所谓“句断”即句子的中断而未完结之意，“句绝”即句子的完结之意。黄以周的解释实系今天所谓“句逗”之意。总之，《礼记》的原意是经过一年的学习，主要检查其是否能断句。

孔子时代的句逗是怎样的符号，已无从了解。然稍后的汉代已有记载。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第五篇〈ㄤ部〉里有“▲有所绝止，而识之也。”此实为今日之逗号。第十二篇〈丿部〉里有“レ，钩识也。从反丿。”此实为今日之句号。清人段玉裁注释道：“钩识者用钩表识其处也，褚先生补《滑稽传》东方朔上书凡用三千奏牍，人主从上方读之，止则乙其处，二月乃尽。此非甲乙字，乃正レ也。”<sup>7</sup>由此可知，至少汉代已有使用这类句逗符号的习惯。清人沈德潜曾指出：“文有评点，以清眉目；有勾乙截住，段落井然。”<sup>8</sup>

清人金埴在《不下带编》卷一里写道：“古人读书，以识字分句读音逗为第一义。按唐人《资暇录》云：‘学识如何观点书。’点书之难，不惟句度、音豆，与读音义同。义理，兼在知字之正音、借音，若某字以朱发平声，即为某字，发上上声，变为某字，去、入又变为某字，知合发不合发为难，不可枚举之。”<sup>9</sup>

金埴说此番话，有个背景，就是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中国书籍丧失大半，项羽咸阳一炬，更是雪上加霜。书籍之厄运，是在汉高祖刘邦去世后才算结束。汉惠帝时废《挟书律》，孝武帝始认真开始书籍的整理工作。又经武帝、成帝的大力征书，使国家藏书初具规模。然而，由于秦始皇的统一文字政策的实行，汉代的人们已很难解读秦以前的文字。因此，识字分句就成了当务之急。汉代所兴起的注释学，可以说主要是识字、分句、解义。这一做学问的传统一直持续到清代。清末叶德辉《书林清话》〈刻书有圈点之始〉条里，有“刻本书之有圈点，始于宋中叶以后。”<sup>10</sup>但到了清代，有圈点刻本依然未占主流，这是因为清人依然把点书看成增长学力，显示学识的重要手段。“学识如何观点书”，正是反映了中国历代学人的心理。

然而，用于点书的句逗，与评点的点之意思还略有差异。所谓圈点亦属点之内容。罗根泽在其著书《中国文学批评史》（三）里写道：“评是很早的，点起何时，可从字训索答。尔雅‘灭谓之点’。郭璞注，‘以笔灭字为点’。唐写本切韵，五代王仁昉切韵，以及宋代重修的广韵，都云‘点、点画’。洪武正韵则云，‘点、注也’。是汉晋所谓点指以笔灭字，唐宋所谓点指以笔点画，元明以后所谓点指以笔点注。点画是长抹，点注是圆滴。”<sup>11</sup>罗氏所云长抹、圆滴实属圈点之例。如按罗氏所释，圈点在唐宋期间就已形成。又清人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里写道：“宋以来改点为圈，如相台岳氏刊五经于一字异音皆加圈识之。”<sup>12</sup>由此可见，以圈代点，圈亦有点之功能。故点非拘于句逗之间，亦包括抹、圈之类的圈点。

### 三 点书二、三例

(1) 宋人真德秀的点书（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sup>13</sup>）

点 句读小点 [ · ]

语绝为句，句心为读。

菁华旁点 [、]

谓其言之藻丽者，字之新奇者。

字眼圈点 [○]

谓以一二字为纲领，如《刘更生封事中》之“和”字是也。

抹

主意

要语

撇

转换

截 [ | ]

节段，如贾生“可为流涕者”之类。

(2) 明人唐顺之的点书（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sup>14</sup>）

长圈 ○○○○○○○○ 精华

短圈 ○○ 字眼

长点 ..... 精华

短点 .. 字眼

长虚抹 ————— 敞

短虚抹 —— 故事

抹 ————— 处置

撇 —— 转调

截 | 分段

(3) 明人苏睿《春秋左传评林选要凡例》<sup>15</sup>

凡批如○者精华。

、者文采

○者国名

□者地名

|者人名

(4) 清人唐彪《书文标记圈点评注法》<sup>16</sup>

◎◎◎◎◎书文纲领与归重处用此

●●●●●书文根因处用此

└ 书文大界限大段落用此

| 书文中大小节次下用此

○、○、○、○、○、文章极佳处用此

○○○○○文章次佳处用此

、、、文章平佳处用此

■ 地名用此

≡≡≡ 官名用此

———— 帝王名人俱通用此

□ 国名用此

===== 年号用此

(5) 日道馆主人《四书千百年眼·凡例》<sup>17</sup>

一、正文节句内有次关通血脉者，从此◎

一、名说内有指破其旁门误处令无走作者，从——

一、名说内有理劈肌分，神理精妙者，从○○○○

次从、、、

一、名说内有点逗本文提缀照应联络血脉者，从 〇〇〇〇

(6) 《程墨二三场艺府群玉圈点凡例》<sup>18</sup>

程 ○○ 绝品 精神光足

、○ 佳品 精神不乏

○ 具品 辞意到家

、、 亚品 辞意堪采

余品 足备将览

墨 、○ 具品才华不乏意趣自佳

○ 亚品亦联成趣

、、 余品就中备览

、 杂品寸绮丽难遗

程墨通例

密圈者 ○○○○ 精神最王

句圈者 ○ 精神次王

长一画者—— 大段。论策二艺中间绝中有续，续中有绝，段落最难分明，不识段落趣旨，俱迷漫诵无益，故特一一表而出之。

短一画者—— 小段。小段淆于大段中合看、同看、分看各义，读者容易生疑，为何故，或彼或此，既不明小段之错综，何以识大段之要会。故又一表而出之。

约而观之，圈点特点有三：第一，圈点包括了宋代以前的句逗之符号。圈点并非限于句逗，每个圈点的符号都被规定了批评内涵，具有文章批评之功能。第二，宋人圈点尚属朴实，符号及

所赋予其内涵较为简单。明、清顺次而下，圈点的符号愈来愈趋于复杂。以圈而言，有长圈、短圈、密圈、句圈者；以点而言，有长点、短点者；此外，还有抹、撇、截、画等等。至于清之科场选本，则颇有八股文繁琐之习气。第三，圈点之形式与内容，全由评点者灵活规定，既适应每本书的特点，又能充分表达评点者的意思。然而这种灵活性也妨碍了评点向理论化、系统化发展，亦是评点走向衰亡的原因之一。本文所举之例，均是经、史、时文诸选本，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之评点，尚未见到如此规定圈点符号。

#### 四 评点之形成

评与点各自都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历史，到了宋代，从“有点无评”或“有评无点”，合而为一，形成评点这一新的文章批评形式。虽然如此，评点一体化亦非偶然，早在汉代就有句逗与注释合而为一的形式，此与评点虽有本质不同，然於读书之方式方法，还是给评点以很大启迪。其实，注释家在注释之余，亦开始注意到文章之法。如唐代孔颖达就曾议论过《诗经》之章法，这说明他在对文章的内容注释的过程中，对文章也发生了极大兴趣。<sup>19</sup>评点虽与注释学无直接关联，但其形式不能说未受注释学之启发。

然而，评点合一的内在原因还不在注释学。要了解其内在原因，还有必要考察一下宋人的评点内容，以观其评点目的和兴趣所在。

先看其古文之评点。宋人古文选本，主要有真德秀《文章正宗》、吕祖谦《古文关键》、谢枋得《文章轨范》以及楼昉《崇古文诀》。清人纪昀认为：“宋人多讲古文，而当时选本存于今者不过三四家。真德秀《文章正宗》以理为主，如饮食惟取御饥，菽粟之外，鼎俎烹和皆在其所弃；如衣服惟取御寒，布帛之外，黼黻章采皆在其所捐。持论不为不正，而其说终不能行于天下。世所传诵惟吕祖谦《古文关键》、谢枋得《文章轨范》及昉之此书而已。”<sup>20</sup>纪昀所言此书即楼昉《崇古文诀》。

这四本选本，各有特点。真德秀《文章正宗》（钦定四库全书本）二十四卷，分辞命、议论、叙事以及诗赋四类。真德秀在《文章正宗纲目》里开宗明义地主张，以“明义理切世用”衡文，不合此原则的“辞虽工，亦不录其目”<sup>21</sup>。这大概是真德秀想强调的“真宗”之意。因而纪昀称之“其持论甚严，大意主于论理不论文。”<sup>22</sup>真德秀选编文章的态度，还是强调“文以载道”，即文章的用世功能。故而选辞命，则曰：“文章之施于朝廷，布之天下者，莫此为重。”选议论，则曰：“今独取春秋内外传所载谏争论说之辞，先汉以后诸臣所上书疏封之属，以为议论之首也。”选叙事，则曰“独取左氏史汉叙事之尤可喜者与后世记序传志之典，则（择）简严者，以为作文之式。若夫有志于史笔者，自当深求春秋大义而参之以迂固诸书，非此所能该也。”选诗赋，则曰：“或曰此编以明义理为主，后世之诗其有之乎？曰三百五篇之诗其正言义理者盖无几，而讽咏之间，悠然得其性情之正，即所谓义理也。（中略）其为性情心术之助，反有过于他文者。”

真德秀以义理衡文，削足适履，不无偏颇。故而明清两代颇有微言。然真德秀强调文章用世之说，则于明清选本所罕见，足可称宋代评点之一特点。

谢枋得《文章轨范》七卷，分“放胆文”与“小心文”两类。所选内容主要是韩、柳、欧、苏，即唐宋两代之文章。谢枋得重视文章作法，其目的在于为科举的士子们提供一个参考。故在“放胆文”前言里强调：“初学熟此，必雄于文千万，场屋中有司亦当刮目。”<sup>2.3</sup>在“小心文”前言里又强调：“场屋中日晷有限，巧迟者不如拙速，论策结尾略用此法度，主司必以异人待之。”<sup>2.4</sup>在评苏轼《秦始皇扶苏论》时，他写道：“今人作场屋程文论，当以此为法。”<sup>2.5</sup>谢枋得之评点，重视字法、句法、章法、文法，这又颇适合明清士子们的胃口，使得《文章轨范》在明清两代大为盛行。

吕祖谦（东莱）《古文关键》二卷，所选内容，韩、柳、欧、苏（老苏与东坡）、颖宾、南丰、宛丘文。其中对韩、柳、欧、苏尤为重视。选文前有〈总论看文字法〉〈论作文法〉〈论文章病〉三篇为全书纲领。在〈总论看文字法〉里，吕祖谦强调：“第一看大概主张。第二看文势规模。第三看纲目关键。第四看警策句法。”<sup>2.6</sup>

此外，还有〈看韩文法〉、〈看柳文法〉、〈看欧文法〉以及〈看诸家文法〉既顾及到整体，又注意到个性。吕祖谦的看文法和作文法是其评点中的独创，丰富了评点的批评形式，后来明清评点多仿此法，如明代文章大家归有光的〈归震川先生总论看文字法〉，则干脆对吕祖谦的〈总论看文字法〉采取了拿来主义。<sup>2.7</sup>其他如〈论作文法〉〈论文字病〉等亦是如此。

楼昉《崇古文诀》三十五卷，所选内容，自先秦文至宋文二百余篇。楼昉受业于吕祖谦，故在承袭师说的基础上，进而阐发己意，颇得纪昀赞许。楼昉评点，文理兼顾，中庸平稳。几无场屋习气。

古文之外，尚有小说之评点。刘辰翁（须溪）《世说新语》之评点，实开文言小说评点之先河。刘辰翁的评点，论文、论事、论理、论情，写得活泼可爱。然就事论事，于论文论理均嫌不足。故而纪昀评论道：“然辰翁论诗往意取尖新，太伤佻巧；其批点如杜甫集、《世说新语》及《班马异同》诸书，今尚有传本，大率破碎纤仄无裨。”<sup>2.8</sup>云云。

综观宋代评点，初具格局。宋人重视唐宋文章，尤重视韩、柳、欧、苏，这给明人总结唐宋八大家提供了一个基本格局。在评点内容方面，略嫌论文不足，论理有余。此外，评点之中，时有注释。所有这些可以说是评点的形成期的特点。

## 五 评点的发展

评点形成于宋代，却在元代没有得到发展。至多在经史的注释中偶见片鳞而已。<sup>2.9</sup>可以说是“注中有评”。评点的再次兴起，是在明代。究其原因，主要是科举制度的实施。据明人王世贞《翁山堂别集》所载，<sup>3.0</sup>明洪武三年五月，成祖颁布《初设科举条格诏》，昭告天下开科取士。八月乡试，四年会试。列朱熹《四书集注》为基本教科书之一。文章笔试即为“代圣贤立言”之八股文。八股文的形成，一般认为是在明成化年间。王鏊被尊为“制义开山”，即指八股文成型于他之手。王鏊强调六经里面有文法，要做好八股文，先要研究经书之文法。这极大地刺激了举子们研究文章作法。明代的一个重要口号是“以古文为时文”。此口号虽有补救举子只读四书的偏颇，然以科举

为目的是明确无疑。

其次，是商业出版的发达，对评点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书肆的活跃，在明人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里有着非常生动的记述。<sup>3.1</sup>甚至出现了以评点为职业的文人，即所谓的“选家”。清人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里描写了以评点为生计的马二这么一个人物。他对年轻举子匡超人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有女颜如玉。’而今甚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sup>3.2</sup>这匡超人日后亦步马二后尘，受文翰楼主人之托，操起了评点业，他对人吹嘘道：“自从那年到杭州，至今五六年，考卷、墨卷、房书、行书、名家的稿子，还有《四书讲书》、《五经讲书》、《古文选本》，家里有个帐，共是九十五本。弟选的文章，每一回出，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的客人，都争着买，只愁买不到手（略）。”“选本总以行为主，若是不行，书店就要赔本；惟有小弟的选本，外国都有的！”<sup>3.3</sup>

吴敬梓所描写的是明嘉靖年间的故事。由此可见，象马二、匡超人那样的选家已有充分的商业意识，而背后推波助澜的正是文海楼、文翰楼那样的出版商。

明代的评点与宋代相比，又有若干不同的特点，主要可以举出以下几条：

第一，明人认为，评点与文章同样，非雕虫小技，乃经国之大业。这一点，在《陈太史评阅史记·凡例》中说得最清楚：“夫文者载道之器，而评文者商道之言也。论文者病于蒙腐与病于诡激恣肆，皆学术世风之忧也。”<sup>3.4</sup>将“商道之言”与“载道之言”并论，重视评点的社会功用，表明了明人对于评点的自觉意识。明末金圣叹评点小说，也是这种自觉意识的表现。清人李渔指出，金圣叹批《水浒》《西厢》“乃愤天下小视其道，不知为古今来绝大文章，故作此惊人之语。”<sup>3.5</sup>

第二，继承宋代评点传统，注重古文的评点。唐荆川、归震川首开其风，唐荆川的《文编》、归震川的《文章指南》、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张鼐的《必读古文》等是明代的代表性选本。特别是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的出现，明确奠定了韩（愈）、柳（宗元）、欧、苏（洵、辙、轼）、王（安石）、曾（巩）的古文大家的地位，给后学者提供了一个简明易学的范本。

第三，重视史书之评点。推重史书，是明代评点的一个重要变化。明人提出一个口号，叫做“以古文为时文”，而其中古文最佳者，乃左氏之《左传》、史迁之《史记》。实际上，《史记》作为纪传体，其文章价值更受重视。如韩敬认为：“文章至司马子长《史记》，而天下之能事毕矣。”（《史记辑评·序》）这种《史记》为文章之最的评价，在明人文章里触目皆是。明人推重史书，还在于对茅坤所编《唐宋八大家文钞》之不满。如黄宗羲就认为：“鹿门八家之选，其旨大略本旨荆川道思。然其圈点句抹多不得要领，故有腴理脉络处不标出，而圈点漫施之字句之间者，与世俗差强不远。”<sup>3.6</sup>由此可知，明人评点史书，不仅在于追求最高的文章楷模，亦在弥补对唐宋八家文的缺憾。

最早重视并评点史书的是明成化年间的王鏊，然他所评《史记》抄本今已不传。王鏊稍后的正德年间杨慎所评《史记题评》，是现存《史记》评点之最早刊本。杨慎以后，许多文章大家，流派的领袖都卷入了《左传》《史记》的热潮里。如竟陵派的钟惺，唐宋派的唐荆川、归有光等都

有《史记》之评本。其中，孙鑛的《孙月峰批评史记》可称这方面的代表。黄宗羲亦称许道：“文章行世，从来有批评而无圈点。自《正宗》《轨范》肇其端，相沿以至荆川文编，鹿门大家，一篇之中，其精神筋骨所在点出，以便读者，非以为优劣也。以后施之字句之间，如孙文融之史汉，波决澜倒矣。”<sup>37</sup>（凡例）孙批史记的最大特点，是对《史记》文法的总结。所谓文法，就是字法、句法、章法。

第四，史书的评点，极大地刺激了小说的评点。以《水浒传》而言，李卓吾的一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金圣叹的七十回本《贯华堂水浒传》。小说的评点，在系统总结文法方面，借鉴史书评点颇多。小说的评点没有史书或古文评点的脉脉相承的历史，《世说新语》评点之后，几百年间，犹如《广陵散》绝。尤其是白话小说之评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此作为叙事文体的《左传》《史记》的评点，便成了小说评点最好的借鉴。然而，小说的评点之目的，与史书、古文评点之目的大相径庭，非为科举，乃为提高小说之地位也。李卓吾从内容上肯定《水浒传》之忠义，金圣叹则从文章上肯定没有出水浒之右者。真正奠定了小说之地位，确立了小说评点的方法。金圣叹明确指出了小说与史书的不同在于，小说是“因文生事”，即所谓“虚构”；而史书是“以文运事”，即所谓“实录”。从理论上确立了小说的独立地位。

在具体批评中，金圣叹在继承文章评点的传统的同时，注意小说的特点，特别是在人物性格方面，对于宋江的分析，评出一个与《忠义水浒传》完全不同的宋江来。他那精湛的评语以及透彻的分析，赢得了世间的赞赏，成为小说评点的高峰。后来小说评点家多借重圣叹之名，评《三国演义》的毛氏父子，伪作金圣叹序，评《西游记》的，自列为圣叹的第七才子书。皆慕圣叹之名也。

金圣叹还充分利用了点书的特点，对《水浒传》施以独特的断句，并对字句作了必要的增减，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一点，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已经指出过。如第五回鲁智深和尚的对话一段，“圣叹于‘听小僧……’下注云‘其语未毕’，于‘……说’下又多所申释，而终以‘章法奇绝从古未有’誉之，疑此等‘奇绝’，正圣叹所为，其批改《西厢记》亦如此。此文在百回本，为‘那和尚便道，‘师兄请坐，听小僧说。’智深睁着眼道，‘你说你说’那和尚道，‘在先敝寺，十分好个去处，田庄广有，众僧极多……’云云，在百十五回本，则并无智深睁眼之文，但云‘那和尚曰，‘师兄听小僧说：在先敝寺，田庄广有，僧众也多……’而已。”<sup>38</sup>

很明显，圣叹在施以独特的断句外，对《水浒传》作了多处修改。大如将《水浒传》第一回改为“楔子”，又将后四十九回删去，成为现在的七十回本。这就是人所讥讽的“腰斩水浒”。小处修改多不胜数，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的《水浒全传》有详细校注，在此不一一赘述。

第五，经书的评点，以四书为盛。所谓四书学与评点也是密不可分的。四书作为明代科举考试的必修教科书，其重要地位不言而喻。钟惺（伯敬）认为：“画前有易，删后无诗，昔言尚矣。四书为六经指南，汉有诂，宋有注，详哉乎言之。然似明而晦，似密而疏，似整而散，逞之而是，几令尼山正脉不绝如线，良可叹也。盖圣言非一读所能了，杼海觅珠，入山探宝几人乎。”<sup>39</sup>要之，



读圣人书，与读古人书别有一番不同，非一般文法所能解。然文章批评方面踵行古文、史书之评点，无甚新意。

第六，经、史、文评点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重视文法。前面已经讲过，评点的兴起，最大原因在于科举。因此，被定为必读教科书的四书五经就成为举子们重点研习的对象。他们力图从中总结出有规律性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文法”。由此可之，明人所言文法，并非今人所言语言学之“文法”，而是作文之法。被尊为八股文开山之祖的王鏊，是最早提出六经有文法的观点，他说：“世谓六经无文法，不知万古义理、万古文字皆从经出也。”<sup>40</sup>尔后茅鹿门、孙月峰亦步其说。孙月峰认为：“宋人云，三代无文人，六经无文法。弟则谓惟三代乃有文人，惟六经乃有文法。”<sup>41</sup>当然，明人探求文法，不只六经，在“无人不评点，无书不评点”的明代，探求文法，已超出六经范围，成为评点的一个普遍现象。

## 六 评点的衰亡

清代的评点在继承明代评点传统的同时，也形成了若干自己的特点。如《儒林外史》里的马二先生所言，评点既不能带注疏气，也不能带词赋气。这种意识在清人评点中尤为明显。明代末期，评点作为一种文章批评的方法，不仅仅出于科举的目的，而是更明确地成为文学批评的主要方式，特别是表现在俗文学的批评方面。到了清代，俗文学的评点日益兴盛。与此相反，史书、经书的评点日趋衰落。史书的评点，已寥若晨星，吴见思的《史记论文》、姚苾田的《史记菁华录》、吴汝伦的《史记集评》等，虽偶有心得，然附骥之谈为多。经书的评点，在明末，形式主义的倾向日趋严重，过度重视文法的结果，产生了所谓的“隆万机法”，即隆庆、万历年间以汤宾尹代表的“机巧纤薄之法”的主张。到了清代，为了纠正这种倾向，方苞提出了所谓“义法”的主张。然而，就评点的整体而言，评点基本上囿于文法的束缚，在文章理论上没有更多的作为，“义法”也不过是作了一些修补工作而已，终究不能挽救评点的危机，随着清朝的灭亡，作为文学批评的主要形式的评点，也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清代的评点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小说与戏曲评点的繁荣。白话小说的评点，始于明代。最早可视为李卓吾所评《忠义水浒传》，其次是金圣叹所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金评《水浒传》可以说是白话长篇小说评点的高峰，是《水浒传》评点的集大成者。然而，小说评点的全面展开，是在清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毛声山父子所评《三国志演义》、张竹坡所评《金瓶梅》。这些评点多仿圣叹评点。毛声山双目失明，评点工作主要靠其子序始进行。序始与圣叹交往亲密，颇受圣叹影响，卷头印有“圣叹外书、声山别集”字样，开篇伪作圣叹之序文，称三国胜过水浒，借圣叹名声抬高己评。此外，诸如《贯华堂评论金云翘》《圣叹先生评绣像第七才子书琵琶记》《绣像金圣叹加评西游真诠》等，都系借金圣叹威光，以提高身价。清代小说评点中，还有脂砚斋评《石头记》、闲斋老人评《儒林外史》、冯镇峦评《聊斋志异》等长篇小说的评点，共同形成了清代小说评点的繁荣局面。

小说以外，尚有戏曲的评点。其代表之作可称圣叹之《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圣叹的《西厢记》

之评点与《第五才子书水浒传》有很大不同。即以禅理入评，这固与宋人严羽《沧浪诗话》以来的影响不无关系，也与金圣叹自身的禅宗修养有密切关系。在人物性格论方面，金圣叹又提出了不少新的创见。例如，如何在人物的相互关系的发展变化中，表现人物性格的分析，就颇有新意。此外，洪昇所评《桃花扇》，提出了历史剧的创作原则，讲究“信史”，这与金圣叹的“一副手眼”的批评方法又迥然不同。

第二，八股文的评点。清人极重视对明人八股文的总结，这方面文集不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是方苞的《钦定四书文》和俞长城的《可仪堂一百二十名家制义》，此外，清代书肆刊行的《明文钞》因附有高塘的评语，亦是值得重视的一个文集。

方苞的《钦定四书文》收有明制义四百八十六篇，有清制义二百九十七篇，共七百八十三篇。方苞的《钦定四书文》主要强调所谓“义法”此在下面详述。

俞长城的《可仪堂一百二十名家制义》每人文前均有〈桐川俞长城论次〉一项，虽属专论，但放眼制义形成历史，论其个人地位作用以及文章得失。因此，综观全书，犹如观八股文之变迁史。试引二三例以观之：<sup>42</sup>

○〈题王守溪稿〉制义之有王守溪，犹史之有龙门，诗之有少陵，书法之有右军，更有百世而不能并者也。前此风会未闻，守溪无所不有。后此时流屡变，守溪无所不包。理至守溪而实，气至守溪而舒，神至守溪而完，法至守溪而备。盖千子、大力、维斗、吉士莫不奉为尸祝。（卷四）

○〈题归震川稿〉嘉靖季年，制义之道衰，蔓延排积，而古法荡然。方麓、莱峰、太冲、敬庵相继继之。犹未能复振。震川先生贯通经术，穷极理奥，而运以史、汉、八大家之气，其古文已成家，更深于制义，力挽颓风，侔之古人，使天下复见宋人经义之旧，厥功茂焉。余尝谓制举业，自古趋时临川以后，守溪，时文之开山也；震川，古文之中兴也。守溪善用偶，震川善用奇。作者如林，莫能驾其上也。（卷十六）

从这两项〈论次〉中，我们可以很容易了解到王鏊和归有光在八股文变迁史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各自的文风。《明文钞》共六编七百四十二篇，高塘在每编前写有序文，虽不及俞长城〈论次〉详致，但纵观时文变迁，论名家得失，与俞长城〈论次〉异曲同工之处。故在此不一一赘述。

第三，“义法”的强调。明代的评点经历了一个由“文法”走向“机法”的形式主义的过程。为此，清人方苞提出了“义法”的主张。方孝岳教授认为，“义法”一词来源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因《序》中有“孔子论史记旧闻，次《春秋》，约其文，去其繁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洽。”的内容，故方苞抽出“义法”二字，以作文章法度之标准。<sup>43</sup>那么，方苞所主张的“义法”是什么概念呢？方苞解释道：“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文集卷二，又书货殖传后）以此观之，方苞所言“义法”似为内容与形式之关系。又《望溪讲授左传义法举要》里，有程銓所撰〈记受左传六篇传指始末〉一篇，其中有这样的记述：

銓与北平王兆符成童以后，并请业于望溪先生。兆符尝以其父昆绳所发挥左传语质与先生

曰：先生于吾父为兄弟交，以道义相然信，而论学则相持，治古文并宗左史，而兆符暨二三同学从问古文，未尝举吾父之说以为鹄的，何也？先生曰：凡所问特为文之义法耳。学者亦或知之而非所急也，且左氏营度为文之意，众人不知而子之先君子独悟者十之三，其中屈折左氏之文以就已说者，以十之三，吾尝面讲而不吾许，是以存而不论也。兆符叩所以，先生为讲韩之战及城濮、鄢陵四篇，请益，又增宋之盟及齐无知乱，每受一篇，必为釜述之。釜大为心开。匪直釜也，凡与闻者，皆以为不可易，而自先生以前二千余年，儒宗文师不闻拟议此也。乃与兆符共辑录而复质于先生，先生为点窜所录之失，其指者且告曰：是余之赘言也。以生等迫欲闻此而偶发之，何必传人之世，使敝精神于蹇浅乎？时釜为夏官司，碌碌吏事，未暇究切。及告归事母，端居多暇，取左氏传，自程日讨论数篇，翻复数过，然后之明于四战之脉络，则凡首尾开合，虚实详略，顺逆断续之义法，更无越此者矣；观于宋之盟而纷琐琐包括贯穿之义法，更无越此者矣。观于无知之乱而行空绝迹，诸法之奇变，为汉以后文家所不能窥寻者具见矣。（略）<sup>44</sup>

由这段记述可知，方苞对弟子王兆符等所讲《左传》数篇之义法，首尾开合、虚实详略诸般，与明人文法没有根本区别。

又观方苞所编《钦定四书文·序》，不言“义法”，只言“义理”。可以推知前“言之有物”之物，即此“义理”也。方苞的这一主张，实为继承了宋人之主张。如真西山的《劝学文》里，有这样一段议论：“至于文章之妙，浑然天成，亦非近世作者所能髣髴。盖其本深末茂，有不期然而然者，学者诚能诵而习之，则义理之精微即有所得。发之于文，亦必意趣深长，议论精确，以之应举，直余事耳。（略）今秋试尚远，群居暇日，正当培养义理之源，务求有用之实。”<sup>45</sup>此段议论，正是对症下药之言。真西山所言“义理”，即指张南轩、朱晦庵二先生之学，亦即朱子学的思想。因此，方苞所言“义法”，不过是为了正本归源，扭转形式主义倾向而已。然而实际上，讲“义法”之“义”，并非易事，如方苞给弟子讲解《左传》时，还是没有摆脱“文法”那一套束缚。

评点虽然在明清文学批评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然而，评点就事论事较多，尽管有着大量的积累，在理论上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颇有李北海的“释事忘义”之嫌。这是评点的一个致命缺陷。以至清代科举制度废止以后，评点不能独立生存和发展，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 注释与文献：

1.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校讎通义》（合订本）p.7，台湾中华书局民国55年3月
2. 清·曾国藩《足本曾文正公全集》p.236，上海东方书局民国24年6月
3. 清·刘声木《菴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p.334，中华书局1998年3月
4. 清·刘声木《菴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p.103，中华书局1998年3月
5. 一般中国文学批评史方面的著书回避这个问题的较多。正面展开议论的，如王运熙、顾易生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1月），有关评点的起源的见解是：“评点起源尚早，而盛于宋代。”（中 p.214）然于《中国文学通史之四》（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将小说评点的起源，初步界定于唐宋之间。（参见《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下》〈评点溯源〉）实际上对评点的起源也没有明确定论，可见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6. 《十三经注疏·礼记》(五), 艺文印书馆影印本
7. 《说文解字段注》p.31, 台湾中华书局民国55年3月
8. 清·沈德潜《唐宋八家文法明辨·凡例》, 日本内阁文库藏本
9. 清·金埴《不下带编》p.1, 中华书局1982年9月
10. 清·叶德辉《书林清话》p.28, 岳麓书社1999年4月
11.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三)p.260, 中华书局1962年10月
12. 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p.15, 台湾中华书局民国59年6月
13. 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合订本)p.96,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5月
14. 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合订本)p.96,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5月
15. 明·李廷机选、苏睿批点《春秋左传评林选要》日本内阁文库藏本
16. 清·唐彪《读书作文谱》(临照堂藏板)日本内阁文库藏本
17. 《四书千百年眼》日本内阁文库藏本
18. 明·唐汝澜《程墨二三场艺府群玉》美国哈佛大学藏本
19. 宋·陈騏《文则》p.30,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5月  
孔颖达曰:“诗章之法, 不长厥体, 或重章共述一事(〈采芣〉之类)或一事叠为数章, (〈甘棠〉之类)或初同而未异, (〈出车〉之类)或首异而末同, (〈汉广〉之类)或事讫而重申, (〈既醉〉之类)或章重而事别, (〈鸛泉〉之类)或随时而改色, (〈何草不黄〉也)或因事而变文, (〈文王有声〉也)或一章而再言, 或三章而一发, (采采芣苢、宾之初筵)篇有数章, 章句多寡不等, 章有数句, 句自多少不同。”
20. 《钦定四库全书·崇古文诀提要》集部八, 四库全书珍本
21.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正宗》集部八, 四库全书珍本
22.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正宗提要》集部八, 四库全书珍本
23.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轨范》集部八, 四库全书珍本
24.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轨范》集部八, 四库全书珍本
25. 《钦定四库全书·文章轨范》集部八, 四库全书珍本
26. 宋·吕祖谦《古文关键》, 丛书集成初编, 中华书局1985年
27. 明·归有光《文章指南》, 台湾广文书局民国61年4月
28. 《钦定四库全书·须溪集提要》集部四, 四库全书珍本
29. 元·吴澄《今文孝经考》(和刻本)日本关西大学藏本  
[右经一章]其首尾相应, 次第相承, 文势连属, 脉络通贯, 同是一时语言
30. 明·王世贞《翁山堂别集》(五), 吴组湘主编中国文学丛书16, 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
31.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 光绪22年广雅书局校刊本
32. 清·吴敬梓《儒林外史》p.195,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12月
33. 清·吴敬梓《儒林外史》p.248,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12月
34. 明·陈仁锡《陈太史评阅史记》, 日本内阁文库藏本
35. 清·李渔《闲情偶记》卷一p.22,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
36. 清·黄宗羲《南雷文定》(一)p.35, 丛书集成初编
37. 清·黄宗羲《南雷文定》(一)丛书集成初编
38. 《鲁迅全集》(九)pp.146-147, 人民文学出版社
39. 明·钟惺《四书参·序》, 日本内阁文库藏本
40. 明·孙鑛《月峰先生居业次编》卷三, 日本内阁文库藏本
41. 清·俞长城《可仪堂一百二十名家制义》, 日本内阁文库藏本
42. 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p.208, 三联书店1986年12月
43. 清·方苞《方望溪文集》卷二, 中华书局
44. 清·方苞《望溪讲授左传义法举要》, 日本内阁文库藏本
45. 宋·真德秀《真西山集》(二)p.107, 丛书集成初编, 中华书局1985年